

# 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 补缺替代关系研究<sup>\*</sup>

王桂新 沈建法

**【内容摘要】** 90 年代以来, 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方面本地下岗待业劳动力日见增多, 与此同时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劳动力涌入就业, 本地劳动力下岗待业与外来劳动力“上岗”就业同时并存发展, 构成了上海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主要从上海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展及分层特征、上海本地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及劳动供给行为特征、外来劳动力的基本属性及劳动供给行为特征等几个方面, 对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补缺、替代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得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

**【作者简介】** 王桂新,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博士, 教授; 沈建法,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系, 博士, 助理教授。

90 年代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方面本地下岗待业 (亦可称失业) 劳动力日见增多, 与此同时又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劳动力涌入就业, 本地劳动力下岗待业与外来劳动力“上岗”就业同时并存发展, 构成了 90 年代以来上海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什么上海本地劳动力下岗待业与外来劳动力“上岗”就业同时并存发展? 是由于二者呈替代关系, 外来劳动力的进入挤占了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岗位? 还是因为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领域、工种与本地劳动力有所不同, 主要形成对本地劳动力就业的补缺关系, 本地劳动力的下岗待业另有它因?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从上海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展及分层特征、上海本地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及劳动供给行为特征、外来劳动力的基本属性及劳动供给行为特征等几个方面, 对上海外来劳动力的就业及其与本地劳动力的补缺、替代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本研究对上海今后推进本地下岗待业劳动力的“再就业工程”、制定外来劳动力的引进战略及雇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1 上海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展及分层特征

### 1.1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展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开发开放浦东”以后, 上海的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在连续保持国内生产总值两位数增长的同时, 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展了旧城区改造, 新城区开发, 地铁、轻轨及高架道路的新建等城市建设热潮。上海空前规模的

<sup>\*</sup> 本研究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 96BSH016) 和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 (项目编号: 2020503) 资助, 特此致谢。

城市建设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刺激劳动力总量需求急剧增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力需求市场。

首先，上海发展特别是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刺激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增长。一方面，主要是上海城市改造、开发和建设热潮的兴起，极大地刺激了建筑业劳动力需求市场的迅速增长；同时，其他如加工制造等传统产业的发展，也创造出一些新的工作岗位。建筑施工、加工制造等第二产业发展形成的这些传统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岗位，基本都是一些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比较脏、累而且危险性相对较大的职种。

其次，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信息技术和服务经济化的发展，引发了第三产业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并由此带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的劳动力需求市场。这一新的劳动力需求市场，主要以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职种为主。如 90 年代以来上海新涌现出的广告传播（包括广告纸派发）、信息咨询、网络业、快餐业、连锁超市、购物配送、社区及家政服务等都是近几年出现的新的劳动力需求市场。与以上传统劳动力市场比较，这一新兴劳动力市场需求规模增大，就业单位及职种增多，尤以钟点工、零工、临时工等具有显著“流动性”特征的短期聘用和多样化的雇佣形态为主。

### 1.2 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特征

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可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高层次的“人才”劳动力市场。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以管理人才、科技人才等“白领”和脑力劳动者为主。在理论和实践上，这一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大门，对上海本地劳动力和外地劳动力都是敞开的。但由于需求规模相对较小，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很高，所以能参与到这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劳动力将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就是说，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门坎”较高、开放程度较大、市场经济特色比较明显的高层次劳动力市场。

第二，中间层次的一般劳动力市场。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中，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规模最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不是很高，一般劳动力（包括外来劳动力）即可参与就业。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市场，首先主要是以保证上海本地劳动力，特别是城镇居民劳动力就业为前提。所以就体制及开放程度来说，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市场还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程度较低、计划体制和地区保护特色较浓、仍未具严格市场意义的劳动力市场。

第三，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上海 90 年代以来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发展所创造的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脏、累、险职种以及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新涌现的连锁超市、购物配送、社区及家政服务等流动性强、收入不高但比较艰苦的职种，基本都属这一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以提供以简单体力劳动为主的脏、累、险职种和流动性强、雇佣多样化职种为主，是这一层次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因此，这一层次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对劳动力的素质一般要求不高，只要能吃苦耐劳、愿意提供劳动即可。在理论和实践上，这一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大门，对上海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基本都是敞开的，可以说是一个低层次的、比较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以上三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了上海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框架。由于各个层次的劳动力需求、雇佣特征、开放程度等都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客观上就对上海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竞争就业形成了一定的限制和分流。

## 2 上海本地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及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 2.1 本地劳动力的供给规模

上海本地劳动力的供给规模, 主要取决于上海户籍人口的数量增长、年龄结构及劳动参与状况。长期以来,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传统生育观念的转变, 上海妇女生育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如在 1990~1995 年间, 出生率已从 10.2% 迅速减半到 5.5%, 1997 年又进一步下降到 4.9%; 妇女总和生育率 1999 年已跌至 0.87 的超低水平。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 使上海户籍人口从 1993 年即开始进入自然负增长阶段, 1997 年自然增长率已持续下降到 -2.4%, 形成显著的“少子化”趋势。同时, 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上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延长。1980 年上海平均预期寿命为 73.3 岁, 到 1997 年增至 77.2 岁, 17 年时间上升了将近 4 岁, 已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并肩; 又由于长期以来上海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人口入迁及人口规模控制政策, 使上海人口几乎处于封闭状态, 年龄结构得不到改善, 少子化迅速发展的同时, 又形成了同样迅速发展的高龄化。单就户籍人口而言, 1996 年其 65 岁以上高龄人口的比例就已上升到 12.45% (王桂新, 2000)。

表 1 上海将来本地劳动力人口增长趋势 (1996~2030 年)

年 份	1996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劳动力 (万人)	775.63	808.82	854.21	857.19	805.82	729.09	660.25	606.17
年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年 龄 结 构								
15~34	35.47	30.62	32.43	35.19	33.31	25.97	16.39	12.38
35~49	50.98	52.70	43.69	33.84	33.15	43.87	57.44	57.12
50~64	13.56	16.68	23.89	30.97	33.54	30.16	26.17	30.51

资料来源: 王桂新. 上海少子高龄化的劳动力效果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0; 3

少子高龄化的迅速发展, 已日益明显地影响着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增长及供给规模。加之教育的普及、提高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使上海本地从业劳动力规模波动增长到 1996 年达到最大峰值 851.21 万人之后, 从 1997 年即开始出现持续减少, 1998 年进一步减少到 836.21 万人; 上海本市职工人数的减少, 比整个从业劳动力提前 5 年, 于 1991 年即达到最大峰值 517.73 万人, 此后即转向持续减少, 到 1998 年已减少到 412.61 万人, 7 年时间减少了 100 多万人, 显示出更快的减速。虽然上海整个从业人数及职工人数的减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但生育水平下降、少子高龄化发展导致本市劳动力供给规模的减少无疑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主要在其影响下, 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增长、供给, 已难以满足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急剧扩大的劳动力需求, 90 年代以来数以百万计外来劳动力的涌入就业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今后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发展, 上海本地劳动力的供给规模还将进一步减少, 并出现更明显的劳动力的高龄化。根据我们的预测, 上海本市劳动力供给规模大致从 2010 年开始转向持续减少, 到 2030 年, 上海每 10 个本地劳动力中将可能有 3 个 50 岁以上的“高龄”劳动力 (见表 1)。这样将使未来上海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并可能严重影响上海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据研究, 大致从 2010 年, 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制约, 上海经济增长将出现减速; 到 2030 年, 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可能使上海人均 GDP 比需求制约条件下的人均 GDP 接近减少 30% (王桂新, 2000)。因此可以说, 90 年代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劳动力来沪就业, 对解决上海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将来随着本地劳动力供给规模的进一步减少, 外来劳动力的补充、就业, 仍将是解决上海本地劳

动力短缺矛盾、满足上海劳动力市场需求增长的重要途径。

## 2.2 本地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及行为特征

从整体来看,作为全国首位大都市的上海,本地劳动力是一支教育程度较高、现代职业素质较好的劳动力队伍。但不可否认,上海本地劳动力也有不少弱点甚至缺点。如不少上海本地劳动力往往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受舒适、声誉、薪金、爱面子等择业观念和因素的影响,在劳动就业选择上容易“挑肥拣瘦”,高难成、低不就。这些行为特征,使上海本地劳动力的供给、就业,主要选择流向前述上海劳动力市场中第一、二层次,特别是第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只有较少低素质劳动力才可能“迫不得已”选择到第三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在工作中,精明多于勤奋,不愿多吃苦受累,劳动勤勉度不高;在失业后,等靠思想严重,不愿主动投身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更不愿去从事一些艰苦的或被人“看不起”的所谓低级工作,有时甚至即使处于失业贫困之中,也不愿放下城市人的“架子”。尽管近几年由于主要受外来劳动力来沪竞争的激励,上海本地劳动力的这种劳动观念及劳动供给行为特征已经有所改变,但总的看来还依然存在。

必须看到,今后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少子化、独生子女化的发展,将难免造成上海本地劳动力出现以下境况:第一,年轻劳动力迅速减少,使上海本地劳动力供给的后备资源日趋“枯竭”;第二,教育的普及、发展及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将使上海本地劳动力及其就业逐步趋向高学历化、白领化和脑力劳动化,从而造成一般劳动力大量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第三,在这种环境下“培育”、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劳动力,多缺乏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甚至形成轻视或躲避到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劳动观念,更不愿从事脏、累、险工种。因此,在目前和今后,上海本地劳动力的这些劳动及供给行为特征,都将在客观上限制他们的就业领域和工种选择。

## 3 上海外来劳动力的劳动供给行为及就业特征

### 3.1 外来劳动力的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根据1997年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上海外来劳动力约有85%来自农村,来沪前的在业者中有近80%为农林牧渔劳动者,即农村劳动力是上海外来劳动力的主体。与本地劳动力比较,上海外来劳动力的基本属性及劳动供给行为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 整体文化素质低,对就业领域和工种的选择性小。上海外来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几乎占85%,小学以下者仍占27%左右的高比例。他们可参与竞争的就业领域和工种主要被局限在上海的中、低层次特别是低层次劳动力市场。

(2) 以男性为主,年轻力壮,有吃苦耐劳精神。外来劳动力以男性为主,约占70%;年龄结构轻,40岁以下年轻劳动力比例高达75%。其次,他们多经历过繁重的农业劳动和农村艰苦环境的磨炼,已培养形成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这些优势将使他们能够竞争并愿意从事上海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中的建筑施工、加工制造等传统产业中的脏、累、险工种。

(3) 劳动勤勉度高,易于管理,“物美价廉”。外来劳动力通常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获得工作机会。这使他们非常珍惜自己获得的工作机会,工作起来认真、努力,表现出很高的敬业精神和劳动勤勉度;老实听话,遵守纪律,易于管理。而且不少外来劳动力与雇主之间一般都没有严格的契约关系,雇主不必承担他们的各种社会福利及保险费用,再加上外来劳动力即使获得的工资低于本地劳动力,但只要高于或接近他们来沪的期

望水平就能接受, 因此对企业雇主来说, 雇佣外来劳动力成本较低, 可谓“物美价廉”。

(4) 流动性强, 具有较大的择业灵活性。在 1997 年调查的上海外来劳动力中, 来沪居住时间在 1 年以内的比例高达 50% 以上, 说明前几年流入的外来劳动力绝大多数已流出上海 (或至少已流出过上海), 而且只有不到 28% 的人准备长期滞留上海, 其他 70% 左右的人, 都想挣些钱、学些技术后回归原地或再到其他地方去。外来劳动力的这一“流动性”特征, 将影响他们工作的相对稳定性, 但同时也将使他们的择业更具灵活性。

(5) 有比较明显的自我职业隔离意识。上海不少外来劳动力自感无力与本地劳动力竞争, 自愿从事一些低收入、低声望职业, 从而在这些职业上形成隔离、封闭性集聚。上海最常见的自我隔离职业, 主要有自由市场、摊贩、拾荒、废品收购、社区及家政服务, 这些职业几乎都被外来劳动力所“垄断”。在上述新兴劳动力市场中, 有很多方面越来越需要向消费者提供小量的或不定时的“个性化”服务。由于本地劳动力都不愿从事这类工作, 这就给一些外来劳动力提供了选择自我隔离职业的机会, 外来劳动力的此种选择也满足了这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 3.2 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流向及特征

上海外来劳动力的基本属性及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形成了他们界于城乡劳动力之间的“边缘性”, 并与上海劳动力市场及供需等方面的其他因素一起, 决定了他们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流向及特征 (见表 2)。

表 2 上海各产业领域、职种及不同经济单位就业的外来劳动力分布 (人)

	合计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三资企业	私营企业	机关	事业单位	乡镇企业	个体	居民家庭	其他
总计	28976	6836	4251	1912	1458	81	692	2319	8576	580	2271
建筑施工	8346	3229	2390	434	206	20	81	343	639	23	981
加工	5028	1578	444	628	481	0	219	1116	513	32	17
手工业	2158	186	185	209	176	2	18	506	818	13	45
运输	1565	240	244	35	74	0	12	72	858	1	29
经商	3658	360	232	196	264	2	9	28	2451	3	113
餐饮服务	1581	173	243	50	109	8	138	11	819	5	25
家庭佣工	487	2	3	1	2	0	1	1	20	439	18
摊贩	1446	1	4	1	4	2	1	16	1377	4	36
投资	47	24	5	4	4	1	0	1	6	0	2
废旧收购	200	1	27	1	0	0	0	0	158	0	13
拾荒	24	0	0	0	1	0	0	1	6	0	16
农业	1084	65	24	4	0	0	25	38	413	24	491
调动分配	71	14	2	20	1	27	0	0	1	3	3
其他	3281	963	448	329	136	19	188	186	497	33	482

资料来源: 根据 1997 年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统计。

首先, 外来劳动力就业流向的主要产业领域和职种, 少见“白领”职业, 具有明显的“务工经商”、“拾遗补缺”特征。如外来劳动力流向的主要产业领域分别是“建筑施工”、“加工”和“经商”, 三类外来劳动力分别占外来劳动力总数的 28.8%、17.4% 和 12.6%。特别是男性外来劳动力, 约有四成 (39%) 从事可谓最艰苦的“建筑施工”; 选择从事“手工业”、“餐饮服务”和“运输”三类职种的外来劳动力也分别占 5% 以上的比例。其他至今仍

尚未“立项”统计的“摊贩”、“家庭佣工”、“废旧收购”、“拾荒”等工种，也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已如上述，上海的这些领域和工种都基本为外来劳动力所“垄断”。

其次，外来劳动力选择就业的经济单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单位和“个体”从业。在1997年上海本市从业劳动力中，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占34.6%（占上海本市职工人数的67.3%），城镇个体劳动者仅占0.9%。与此不同，上海外来劳动力流向国有经济单位就业的只有23.6%，而流向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或自我雇佣、个体从业的外来劳动力几乎占70%。其中尤以“个体”从业者比例最高，约占30%。

可以看出，上海外来劳动力参与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以建筑施工、加工等第二产业为主的传统劳动力市场和以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为主的新兴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方式、从事的工种以及流向的单位性质，都表现出明显的艰苦性、流动性、隔离性和多样化、市场化、非正规化特色。

#### 4 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补缺、替代关系分析

以上考察了90年代以来上海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展及分层特征、上海本地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及劳动供给行为特征、上海外来劳动力的基本属性及劳动供给行为和就业流向特征。这是我们分析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补缺替代关系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因为正是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补缺、替代关系的性质。

##### 4.1 总体分析

首先，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在总体上主要是表现为补缺关系。这是因为：第一，90年代以来，上海空前规模的城市建设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刺激劳动力总量需求急剧增长，本地劳动力的供给已不能满足上海劳动力市场的总量需求，需要外来劳动力的补缺；第二，主要受产业结构调整、本地劳动力劳动供给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使上海某些产业领域和工种也形成一定程度的结构性不足，需要外来劳动力的补缺；第三，由于城乡就业体制的制约，劳动力市场分层特征和地方就业保护政策的存在，以及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劳动供给行为的差异，使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领域、工种和单位有所不同。所以决定了大量外来劳动力迁沪就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决定了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在总体上主要表现为补缺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保守一点估计，90年代每年至少应补充150万人以上、约占当年本市从业人员20%左右的外来劳动力，才能满足上海劳动力市场的总量需求、保证上海经济社会活动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其次，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也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上海实际的劳动力市场是十分复杂的。单就劳动力素质或技能来讲，虽然外来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低于上海本地劳动力，但上海本地劳动力也并非人人都是“精英”，一些文化素质较低的本地劳动力，在就业竞争中往往被“排斥”到上海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与外来劳动力一起竞争就业；而且也不排除某些素质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外来劳动力闯入中、高层的劳动力市场，与上海本地劳动力一起竞争就业。所以，上海外来劳动力不可避免要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的替代影响。

##### 4.2 外来劳动力可能形成替代影响的主要产业领域、工种和单位职工类型

###### 4.2.1 外来劳动力可能形成替代影响的主要产业领域和工种

在三大产业及其工种中，从事农业（第一产业）经济活动的外来劳动力，基本不会对上

海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替代影响。形成替代影响的，主要是第二、三产业领域及其工种。

第一，流向加工制造、手工业领域和工种的外来劳动力可能会对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替代影响。在有 53.6% 的外来劳动力流向的建筑施工与加工制造、手工业等第二产业领域中，建筑施工属典型的传统劳动力市场，脏、累、险工种高度集中，上海本地劳动力多不愿光顾。而且在沪从事建筑施工的外来劳动力，绝大部分都是外地建筑单位根据上海的需求成建制应标来沪的，所以这些从事建筑施工的外来劳动力，将主要表现为对上海本地劳动力就业的补缺而不会形成替代影响；加工制造、手工业是上海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支柱产业”，劳动力需求规模大，各类工种分布较多，虽然工作也比较艰苦，但仍然是上海本地劳动力的重要雇佣领域。外来劳动力也有较高的比例（近 25%）流向这一领域，与本地劳动力竞争就业，因此加工制造、手工业将是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就业可能形成替代影响的产业领域之一。由于在加工制造、手工业领域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工种仍存在某些“偏离”，所以在这一领域就业的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也具有一定的补缺作用。亦即在加工制造、手工业领域就业的外来劳动力对该领域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实际具有补缺、替代的双重影响，而且其替代影响不会很明显。另外，1997 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海流向建筑施工和加工制造、手工业领域的外来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单位或个体从业。如果他们对这些部门的本地劳动力形成明显的替代影响，一般应引起这些部门本地劳动力的减少。然而，90 年代以来，在上海本市职工总人数及建筑施工、加工制造等职工人数均呈减少趋势的情况下，在其最可能受外来劳动力替代影响的“其他”类型的本市职工人数却仍反呈增长趋势（见表 3）。这虽然可能受“转制”等因素的重要影响，但也从另一个方面间接说明，在这些产业领域和经济单位就业的外来劳动力，并未对在这些单位、从事同类工种的上海本地劳动力形成很明显的替代影响。

表 3 上海一些行业及经济单位本市劳动力职工人数的变动

万人

	1993 年				1998 年			
	合计	国有	集体	其他	合计	国有	集体	其他
职工总数	490.35	352.47	84.69	53.19	412.61	259.07	59.81	93.73
制造业	252.62	166.06	42.03	44.53	178.37	88.96	25.74	63.67
建筑业	23.32	19.25	3.66	0.41	19.92	11.47	3.31	5.14
商贸餐饮业	52.88	25.75	24.72	2.41	46.71	22.50	17.59	9.62
社会服务业	29.28	22.43	3.61	3.24	30.93	20.42	3.16	7.35
# 公共服务业	18.08	15.97	1.56	0.55	16.38	13.05	1.05	4.17
# 居民服务业	3.50	1.33	1.31	0.86	2.08	1.23	1.14	0.37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1994、1999。

第二，运输业、经商和餐饮服务业等将是可能对上海本地劳动力就业形成替代影响的第三产业领域。根据经商、运输、餐饮服务及摊贩等第三产业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以及上海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劳动供给行为特征，相对上海本地劳动力，外来劳动力一般更适合、也比较愿意从事这些经济活动。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中商贸餐饮、社会服务等工种的本地劳动力最有可能受外来劳动力的替代影响，但表 3 显示的结果，也同样否认了这一推断。实际上，其中就业人数最多的从事经商和餐饮服务工种的外来劳动力中，分别有 67% 和 52% 为

个体雇佣形式，这种雇佣形式基本都不会对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替代影响；几乎被外来劳动力所“垄断”的家庭佣工、摊贩、废旧收购、拾荒等，更属上海劳动力市场需要补缺的领域和职种；携资来沪的外来劳动力数量很少，对上海发展大有好处，他们的投资只能促进本地劳动力的就业而不会形成替代影响。因此可以说，在流向第三产业领域的外来劳动力中，主要有从事运输业、约占（外来劳动力）5.4%的外来劳动力和从事经商、餐饮服务等行业、职种的外来劳动力可能会对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的替代影响。

综上所述可知，流入传统劳动力市场、从事建筑业职种的外来劳动力和流入新兴劳动力市场、从事家庭佣工、摊贩、投资、废品收购、拾荒等职种、基本以非正规形式就业的外来劳动力，以及选择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外来劳动力（合计占40.2%），一般都不会对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替代影响。可能对上海本地劳动力就业形成替代影响的，主要包括流入加工制造、手工业、运输、调动分配以及“其他”等产业、职种的外来劳动力。假设流向加工制造、手工业、运输及“其他”等领域的外来劳动力（合计占41.5%）中约有30%可能对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替代影响，包括调动分配的外来劳动力，大致可占外来劳动力总数的13%；流向经商和餐饮服务领域的外来劳动力（占18.1%），也可能对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替代影响，假设其中约有10%可能对同在这些领域的上海本地劳动力形成替代影响，那么流向经商和餐饮服务等领域、可能对上海本地劳动力形成替代影响的外来劳动力接近占外来劳动力总数的2%。也就是说，根据1997年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将主要有约占15%、27万左右流向加工制造、手工业、运输、调动分配、经商、餐饮服务以及“其他”等产业领域和职种的外来劳动力，可能会对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替代影响。另据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1997年对40个市属单位和6个区县的不完全调查，也知可能对本市城镇居民劳动力就业形成替代影响的外来劳动力约占16%。可见这两个比例非常接近、也比较可信。而实际上，根据以上假定和推断，1997年上海仅有8%左右的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造成了直接的替代影响。

#### 4.2.2 可能受外来劳动力替代影响的本地劳动力及单位职工类型

一般来说，外来劳动力对上海本地劳动力可能形成替代影响的基本前提，是同处一就业领域或工作单位，从事相同、相似或可以相互替代的职种（工作）。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可能受外来劳动力替代影响的上海本地劳动力及职工类型，主要是分布在上海第二、三产业领域的城镇居民劳动力，特别是其中素质较低的非正式职工（或称在岗临时工）。因为目前的城市就业体制仍然对外来劳动力在沪就业有很大的制约，使外来劳动力还无法与上海“单位”雇佣的本地正式职工“平等”竞争。而且90年代以来，上海各类“单位”都已基本实行了全员合同制，单位与其正式职工之间都建立了一定的契约关系，正式职工包括失业在内的就业等权益都将得到法律的保障，所以他们的就业绝不是外来劳动力可以轻易撼动和替代的。而上海单位雇佣的本地非正式职工则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是非正式职工，与其临时就业的单位之间一般都没有明确的契约关系，他们的就业实际上与外来劳动力差不多，也有一定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所以最容易受到外来劳动力的竞争威胁和替代影响。1996年上海有13.54万“在岗临时职工”，到1997年、1998年依次减少到11.36万和9.85万人。上海“在岗临时职工”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受外来劳动力的替代影响，还是由于他们自己努力或通过上海“再就业工程”又重新成为单位正式职工等原因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更深

入地调查研究,但从上海本市正式在岗职工人数同样呈减少趋势的事实,我们还是可以推断,上海“在岗临时职工”重新成为单位正式职工的可能性很小,因受外来劳动力替代影响而减少的可能性却相对比较大。

#### 4.3 企业单位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补缺、替代关系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探明外来劳动力对上海单位雇佣本地劳动力中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补缺、替代影响,我们于 1999 年调查了上海 98 家不同类型的企业单位,把调查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划分为上海本地正式职工、非正式职工和外来劳动力三部分,并构造了包括这三部分劳动力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以下分析。我们构造的生产函数如式 (1) 所示:

$$Y_j = G(K_j, L_j^r, L_j^i, L_j^f) \quad (1)$$

式中,  $Y_j$  为第  $j$  企业的生产总额 (以收入总额表示);  $K_j$  为第  $j$  企业的资本投入 (以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和表示);  $L_j^r$ 、 $L_j^i$ 、 $L_j^f$  分别为第  $j$  企业雇佣的上海本地正式职工、非正式职工和外来劳动力,三类劳动力均以年平均人数表示,并假定他们是等质的。

对式 (1) 两边取自然对数变换为以下对数函数:

$$\begin{aligned} \ln Y_j = & \alpha_0 + \alpha_1 \ln K_j + \alpha_2 \ln L_j^r + \alpha_3 \ln L_j^i + \alpha_4 \ln L_j^f \\ & + \alpha_5 \ln K_j \ln L_j^r + \alpha_6 \ln K_j \ln L_j^i + \alpha_7 \ln K_j \ln L_j^f \\ & + \alpha_8 \ln L_j^r \ln L_j^i + \alpha_9 \ln L_j^r \ln L_j^f + \alpha_{10} \ln L_j^i \ln L_j^f \end{aligned} \quad (2)$$

式中,  $Y_j$ 、 $K_j$ 、 $L_j^r$ 、 $L_j^i$ 、 $L_j^f$  的含义与上相同,  $\alpha_0$ 、 $\alpha_1$  为参数。根据该函数,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全微分,并用上述 98 家企业单位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可知:

第一,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正式职工交叉项的推断系数符号为正,与非正式职工交叉项的推断系数符号为负,显示在最优化原则下,上海企业单位中外来劳动力对本地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影响关系不同,对本地正式职工主要是补缺作用,而对本地非正式职工则是替代影响。可见这与以上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外来劳动力对上海本地非正式职工形成替代影响的原因,上面已做分析。关于外来劳动力与上海本地正式职工的补缺关系,除以上提及的原因以外,可能还由于在企业单位,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多表现为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雇佣了外来劳动力,就需要增配相应的本地正式职工管理者,使外来劳动力雇佣增加,本地正式职工也相应呈增加趋势。另外,外来劳动力与资本投入交叉项的推断系数符号亦为负,说明企业雇佣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可以在某些方面替代企业的资本投入,从而使企业减少资本投入,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从短期影响来看,在假定上海企业单位本地正式职工工资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对外来劳动力的雇佣每增加 1%,将可能引起企业单位对本地正式职工的雇佣增加 0.10% 左右,但也将可能使企业单位雇佣的本地非正式职工工资收入下降 0.11%;在假定企业单位本地非正式职工工资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对外来劳动力的雇佣每增加 1%,将可能使企业对本地非正式职工的雇佣减少 0.13%,也将可能使企业雇佣的本地正式职工工资收入下降 0.33%;在假定企业单位本地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工资都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对外来劳动力的雇佣每增加 1%,将可能使企业对本地正式职工的雇佣增加 0.04%,但同时也将可能使企业对本地非正式职工的雇佣减少 0.15%。这一分析结论说明,不仅外来劳动力对上海企业单位雇佣的本地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补缺、替代影响不同,而且上海企业

单位雇佣外来劳动力特别是增加对外来劳动力的雇佣，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增长，降低企业的劳动成本。

## 5 几点结论

综合以上研究，主要可得以下结论：

(1) 90年代以来，上海本地劳动力已不能满足城市建设及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总量需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上海本地劳动力的素质、劳动供给行为等因素，又造成了上海劳动力市场中的某些结构性短缺矛盾。今后上海本地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及结构性短缺矛盾还将进一步加剧。外来劳动力的迁沪就业，满足了上海劳动力市场的总量需求，缓解了上海劳动力市场中某些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对上海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从总体来讲，外来劳动力对上海劳动力市场及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主要是表现为补缺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2) 上海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也存在一定的替代影响，特别是流入和从事加工制造、手工业、运输、调动分配以及“其他”等第二、三产业领域及工种的外来劳动力，都可能对就业在同一产业领域、从事相同、相似或可相互替代职种的上海本地劳动力形成一定的替代影响。根据1997年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流向这些产业领域和工种，约占（外来劳动力总数）15%、27万人的外来劳动力可能对上海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替代影响，而实际上则只有不超过8%的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了直接的替代影响。

(3) 可能受外来劳动力替代影响的上海本地劳动力及职工类型，主要是分布在上海加工制造、手工业、运输、调动分配以及“其他”等第二、三产业的城镇居民劳动力，特别是其中企业单位雇佣的非正式职工（或称在岗临时工）。从短期影响来看，在假定工资不变条件下，上海企业单位雇佣的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中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补缺、替代影响不同：外来劳动力对本地正式职工的雇佣主要表现为补缺作用，外来劳动力的增加可使本地正式职工的雇佣有所增加；对本地非正式职工的雇佣主要表现为替代影响，外来劳动力的增加将排斥本地非正式职工的雇佣而使其减少。

(4) 上海企业单位雇佣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可以在某些方面替代企业的资本投入，有利于企业减少资本投入；企业单位雇佣外来劳动力特别是增加对外来劳动力的雇佣，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增长，降低企业的劳动成本。这说明，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雇佣外来劳动力，这两个方面的“效应”都十分有利于雇佣企业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区域角度来讲，鼓励外来劳动力进城就业，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还有利于控制或缩小地区及城乡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城乡经济的平衡发展及整体水平的共同提高。

(5) 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补缺、替代关系，受很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不仅受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城市就业体制（政策）、劳动力市场分割、本地人口变动及劳动力供给规模等宏观“外因”的深刻制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海本地劳动力、外来劳动力的基本属性及劳动供给行为等微观“内因”的影响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为了妥善解决外来劳动力迁沪就业与本地劳动力下岗待业的矛盾，必须从系统角度，全面、综合地考虑以上各种影响因素。特别要注意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实现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就业的公平竞争；加强对上海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努力培养其职业意识和敬业

精神，提高其劳动勤勉度和就业竞争力。

注释：

转引汤文建. 民工城乡两栖型就业与城市化. 人口, 1999; 4

详细分析过程参见王桂新等：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补缺关系研究（研究报告）。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2000年2月。

参考文献：

- 1 王桂新等. 上海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补缺关系研究（研究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2000
- 2 王桂新. 上海少子高龄化的劳动力效果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 3
- 3 王午鼎主编. 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 4 张声华主编. 上海流动人口的现状与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5 陆炳炎主编. 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6 沈建法. 城市化与人口管理. 科学出版社，1999
- 7 Shen J. 1998, China's futur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64 (1): 32~40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native and Native Labor in Shanghai**

Since 1990s,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hanghai labor market, where the coexistence of increasing native labor who is laid off and unemployed and millions of non-native labor who is rushing in and being employed form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ve and non-native labor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demand development and stratified characteristics in Shanghai labor market, the size and behavior traits of native and non-native labor separately. On the above basis, some meaningful conclusions have been reached.

*Wang Guixin is PhD and professor, Population Institute of Fudan University; Shen Jianfa is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Geography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责任编辑：陈 卫 石 玲 收稿时间：2000 - 11)

新 春 愉 快